

明代塞爾登地圖的臺灣地名：  
一個針路判讀的個案

施雅軒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

## 摘要

「塞爾登地圖」是在 2008 年在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所發現的一張古老的東亞地圖，經多位學者推論應屬於明代末年的作品，因為上面有繪製臺灣的圖像，這使得上面標註的兩個地名－「北港」與「加里林」，格外引起注意，本文將透過一系列文獻的解讀，來進行相關的討論。

針對臺灣在歐洲古地圖的多島化，利用討論古地圖繪製文本，本文透過針路文本的取得，可以得到符合歷史脈絡的解釋，而「塞爾登地圖」內的「臺灣」，並非是一個完整的島嶼，而是「小琉球」的對應版本，而南端的「加里林」是座落於高雄，來自「搭加里揚」部落的漢譯地名。

關鍵字：塞爾登地圖、臺灣、歷史地理、地名、針路

## 壹、前言

本文所談的「塞爾登地圖」，是在 2008 年在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的地下室，所發現一張古老的東亞地圖，由於該圖是英國國際海洋法學者塞爾登（John Selden）於 1659 年所捐贈，英文原名稱之為「中國塞爾登地圖」（The Selden Map of China），<sup>1</sup> 而博德利圖書館內部中文出版品稱為「東西洋航海圖」，<sup>2</sup> 但由於涉及命名話語權的考量，也有學者提出若干中文名稱，如「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通交圖」、<sup>3</sup>「鄭芝龍航海圖」、<sup>4</sup> 或是「牛津明末閩商航海圖」，<sup>5</sup> 為了統一稱謂，本文採用英文名稱的中文譯名，一律稱為「中國塞爾登地圖（簡稱塞爾登地圖）」。

「塞爾登地圖」大約長 1.5 米，寬 1 米，繪製地域北起西伯利亞，南至今印尼爪哇島和馬魯古群島（香料群島），東達北部的日本列島和南部的菲律賓群島，西抵緬甸和南印度，由於地圖上方畫上比例尺，以及一幅中國民間傳統的航海羅盤方位圖，<sup>6</sup> 加上該圖並沒有標示繪製年份，使得不同的學者有著不同的推論年份，如錢江推定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陳佳榮推定 1607 年至 1624 年、林梅村推定 1633 年至 1644 年、卜正民（Timothy Brook）推定 1607 年至 1609 年，<sup>7</sup> 不論何種年代，皆可以化約為是明末的地圖作品，這也宣示著繪製者所登錄的空間資訊，可以推斷來自明末時序的延伸。

1 王翠霞，〈解析《塞爾登地圖》所繪之東西洋貿易概況及其對中國政經的影響〉，《海洋事務與政策評論》7 卷 1 期（2019 年 3 月），頁 91。

2 聶洪萍，〈「東西洋航海圖」與明代中國〉（Oxford：University of Oxford，2014 年），頁 1。

3 陳佳榮，〈《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通交圖》編繪時間、特色及海外交通地名略析〉，《海交史研究》2 期（2011 年），頁 52。

4 林梅村，〈《鄭芝龍航海圖》考——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藏《雪爾登中國地圖》名實辯〉，《文物》9 期（2013 年），頁 64。

5 周運中，〈牛津明末閩商航海圖與李旦關係新證〉，《閩商文化研究》1 期（2015 年），頁 43。

6 錢江，〈一幅新近發現的明朝中葉彩繪航海圖〉，《海交史研究》1 期（2011 年），頁 3。

7 王翠霞，〈解析《塞爾登地圖》所繪之東西洋貿易概況及其對中國政經的影響〉，頁 96。

在這個前提下，這張古地圖也出現「臺灣」圖像當下，不禁令人好奇，這張明末的地圖上，有何空間資訊被人所認知而登錄？該圖判讀以福建泉州為中心，右下角有「彭」標註，即為現今「澎湖」所在地，透過方位比對，以東便是臺灣，其間標示兩個地名，分別為「北港」和「加里林」（圖 1），這樣的地名標示，若比對明代文獻所理解的臺灣歷史鋪陳，就會發現兩個不解的問題。

第一、為何沒有「雞籠、淡水」的標註？「雞籠、淡水」這兩個地名在明代文獻並不陌生，如 1575 年，即「萬曆三年，巡撫劉堯誨請稅船以充兵餉。於是設商引，由海防官管給；每引徵稅有差，名曰引稅（東、西洋每引稅銀三兩，雞籠、淡水二兩；後倍之）。」<sup>8</sup>顯示著十六世紀七十年代，「雞籠、淡水」這兩個地名已經出現在官方文書，而萬曆 20 年（1592）至 22 年（1594）所任福建巡撫的許孚遠，<sup>9</sup>其所刊印的「敬和堂集」中所載「海禁條約行分守漳南道」一文，提及「又有小番，名雞籠、淡水，地鄰北港捕魚之處，產無奇貨水程最近，與屬東、福寧州、浙江、北港船引，一例原無限數，歲有四、五隻或七、八隻不等」，<sup>10</sup>也就是姚旅於萬曆 34 年（1606）開始著手撰述的「露書」，其內所提：「鹿筋、烏魚子、鰻魚脬最佳味，而海澄最多，皆來自北港番。」<sup>11</sup>，由此突顯出明代臺灣的東亞沿海的空間分工上，「北港」是捕魚基地，而「雞籠、淡水」是貨物轉運站，「塞爾登地圖」光標註捕魚基地卻忽略貨物轉運站，所為何來。

8 周凱，《廈門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頁 194。

9 吳幅員編，《明史選輯》（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 年），頁 140-141。

10 周婉窈，《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臺北：聯經，2012 年），頁 45。

11 邱仲麟，〈姚旅《露書》中的明代社會經濟史料〉，《明代研究通訊》4 期（2001 年），頁 23、44。



圖 1 塞爾登地圖的部分。

資料來源：<https://seldenmap.bodleian.ox.ac.uk/>

第二、為何要標註「加里林」或是「加里林」在那裡？地圖是空間資訊的簡化外顯，「北港」是重要的捕魚基地，可以解釋有其登錄的必要性，但是「加里林」的必要性是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的難度，首先要知道「加里林」所指何處，目前文獻推論有兩，一是「臺南佳里」，<sup>12</sup>二是「彰化二林」，<sup>13</sup>但是比對明代曾來臺灣的陳第，在〈舟師客問〉一文提及「直至東番，圖其地里，乃知澎湖以東，上自魴港、下至加哩」<sup>14</sup>，就會發現這兩個「加里林」地點推論，與陳第東番南界有所衝突，假設將「魴港」視為「北港」的另音標記，「加哩」為「加里林」，如此「塞爾登地圖」可以完全呼應陳第「東番」的南北空間意象，在現今「臺南佳里」或是「彰化二林」皆無法滿足「東番」南界的要求上，顯然「加里林」另有其地。

12 湯錦臺，《閩南海上帝國：閩南人與南海文明的興起》（臺北：如果出版，2013年），頁183。

13 翁佳音，〈釋〈東番記〉中的近代初期番漢關係〉，《原住民族文獻》20期（2015年），頁48；陳宗仁，〈Selden Map 有關臺灣與琉球的描繪及其知識淵源：兼論北港與加里林的位置與地緣意涵〉，《臺灣史研究》27卷3期（2020年），頁34。

14 沈有容編，《閩海贈言》（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頁29。



針對以上兩個問題，本文將利用相關文獻與古地圖，作為討論的基礎，應用歷史地理的研究方法，試圖回答以上兩個問題，首先將從「塞爾登地圖」上所繪製的「針路」開始。

## 貳、地圖上的針路

「針路」，即「渡海以指南為信，曰針路」<sup>15</sup>，「放洋全以指南針為信，認定方向，隨波上下，曰針路。」<sup>16</sup>，用現代的術語，就是遠洋渡海利用羅盤方位與自然地勢所標定的航線，由於古代並沒有現今所謂的衛星定位，在茫茫大海中，如此知曉航向的正確，這就是「針路」扮演的重要性，「徑望東西洋而去，與海島諸夷相貿易；其出有時，其歸有候。廣洋巨浸，船一開颿，四望惟天水相粘無畔岸。而海人習知海道者，率用指南針（即羅經）為其導嚮。」<sup>17</sup>，如此海外航行的成敗，「針路」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而「塞爾登地圖」上所繪製的「針路」共有兩條（圖 1），通過臺灣北端者，以單線標示，從福建出發到琉球，通過臺灣西端者，以雙線標示，從福建出發到馬尼拉，透過理解針路脈絡的理解，可以發現一條完整的「針路」訊息需要三個因子配合：

一、方位：「針路」所使用的方位，來自傳統中式羅盤（羅經）利用天干地支所構成的「二十四方位」，「塞爾登地圖」的特殊性之一，便是在地圖上方附有方位的對照表（圖 2），以現代方位角的概念，便是每個方位之間差 15 度角（表 1），如甲針，便是以方位角 75 度航行，以此為基礎，稱為「單針羅經」，若取中間值，則可再細分為四十八方位，以相鄰二方位名稱並列，表示兩方位角度的平均值，<sup>18</sup>如甲卯針，即取甲針與卯針 90 度的中

15 孫元衡，《赤崁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頁 50。

16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頁 51。

17 百吉編，《清一統志臺灣府》（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頁 60-61。

18 黃清琦，〈紙頁上的大海東西方航海圖的發展歷程〉，《瞰海》（臺北：廣場出版，2017 年），頁 34。

間值，即方位角 82.5 度，這個概念就是「雙針羅經」，「針路」的使用，在船一出海便需要透過「方位」資訊以控制前往目的地的航道上。如此，「塞爾登地圖」上通過臺灣北端的「針路」，即從福建出發後，輔助現代方位角的概念，便是「辰（120 度）」-「乙卯（97.5 度）」-「卯（90 度）」-「乙卯（97.5 度）」-「卯（90 度）」-「乙卯（97.5 度）」到琉球，而通過臺灣西端者，從福建出發後，標註「甲卯（82.5 度）」-「丙（165 度）」到馬尼拉。

二、參考點：「針路」所使用的參考點，大海中需要不會變動的自然地勢為準，最可靠的莫過於島嶼的分布，針路中統稱為「山」，如「船行海中，全以山為準」<sup>19</sup>，「海以山為路，一失此山，將無所歸，漂於他國未可知也，漂於落漈未可知也。守此尚可以生，失此恐無以救。」<sup>20</sup>，針對「山」的標註，在航海者的心目中，建構出獨特的地名導引；如從日本松浦往呂宋的針路上，記錄為：「柯子門開船，丙（編按：165 度）丁午（編按：187.5 度）及丁未（編按：202.5 度）十更見五島山。過去遠用坤申（編按：232.5 度）放洋五十四更，若不見山，用丁未（編按：202.5 度）二更見小琉球雞籠頭山。巡山使上用丙午（編按：172.5 度）六更見北港沙馬頭大灣山，丙午（編按：172.5 度）三十五更取射崑美山」<sup>2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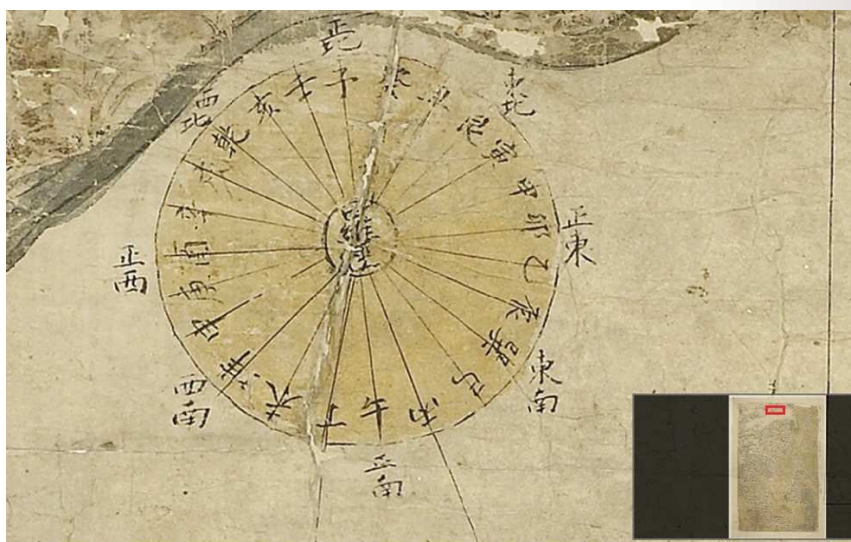


圖 2 「塞爾登地圖」的羅經。

資料來源：<https://seldenmap.bodleian.ox.ac.uk/>

19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 年），頁 12。

20 吳幅員編，《使琉球錄三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 年），頁 12。

21 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91。

表 1 羅經二十四針與方位角的對照表

二十四針	方位	方位角	二十四針	方位角	二十四針	角度
子	正北	0 度	癸	15 度	丑	30 度
艮	東北	45 度	寅	60 度	甲	75 度
卯	正東	90 度	乙	105 度	辰	120 度
巽	東南	135 度	巳	150 度	丙	165 度
午	正南	180 度	丁	195 度	未	210 度
坤	西南	225 度	申	240 度	庚	255 度
酉	正西	270 度	辛	285 度	戌	300 度
乾	西北	315 度	亥	330 度	壬	345 度

三、時間：「針路」所使用的時間單位稱為「更」，船一出海何時會看到參考點，有賴於「針路」上所記載的時間，這就是「更」的用法，「海中船行里數皆以更計；或云百里為一更，或云六十里為一更，或云分晝夜為十更。今問海船夥長，皆云六十里之說為近。」<sup>22</sup> 如此經過計算，一更就是 2.4 小時的水程，或是「六十里」，但由於受有風、無風、順風、逆風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更」數往往不能絕對精確，<sup>23</sup> 卻是沒有辦法中的時間標記法。

面對建構針路的方位、參考點、時間等三個資訊，但是「塞爾登地圖」只有「方位」資訊，因此需要另外輔助的針路比對，才能理解「參考點」和「時間」，而最合適比對的針路文本，莫過於一樣存於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的《順風相送》；目前《順風相送》流通的針經版本，來自 1935 年向達所抄錄，後在 1961 年結合另一本《指南正法》出版《兩種海道針經》，<sup>24</sup> 根據陳佳榮推估，《順風相送》成書於大約 1593 年，

22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頁 8。

23 黃清琦，〈紙頁上的大海東西方航海圖的發展歷程〉，頁 34。

24 張榮、劉義杰，〈《順風相送》校勘及編成年代小考〉，《國家航海》2 期（2012 年），頁 78。



並認為初源為吳樸的《渡海方程》（撰於 1537 年），由於《順風相送》於 1639 年由坎特伯里主教、牛津大學校長勞德大主教（Arch. Laud）贈送給該校的鮑德里氏（編按：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則其編訂年代的下限自不會晚於 1639 年，<sup>25</sup> 如此來輔助比對於晚餘二十年（1659）所捐贈的「塞爾登地圖」，藉此理解地圖上與傳統上的「針路」有何差異性。

### 參、北端針路下的「雞籠、淡水」

「塞爾登地圖」所繪製臺灣北端針路，這條福建通往琉球的針路，從福建出發後，航線標示分別是「辰（編按：120 度）」-「乙卯（編按：97.5 度）」-「卯（編按：90 度）」-「乙卯（編按：97.5 度）」-「卯（編按：90 度）」-「乙卯（編按：97.5 度）」到琉球，而同樣的起點與終點，「順風相送」可比對的，是「福建往琉球」的針路記載：「太武放洋，用甲寅針七更船取烏坵，用甲寅並甲卯針正南東牆開洋，用乙辰（編按：112.5 度）取小琉球頭，又用乙辰（編按：112.5 度）取木山。北風東湧開洋，用甲卯（編按：82.5 度）取彭家山。用甲卯（編按：82.5 度）及單卯（編按：90 度）取釣魚嶼。南風東湧放洋，用乙辰針取小琉球頭，至彭家、花瓶嶼在內。正南風梅花（在閩江口之長樂）開洋，用乙卯（編按：97.5 度）取小琉球。用單乙（編按：105 度）取釣魚嶼南邊。用卯針（編按：90 度）取赤坎嶼。用反針取枯美山，南風用單辰（編按：120 度）四更，看好風單甲（編按：75 度）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馬齒山，是麻山亦嶼。用甲卯針（編按：82.5 度）取琉球國為妙」<sup>26</sup>，可以發現雖然起始點相近，但是「塞爾登地圖」比《順風相送》的航線接近「直線」，「直線」顯示出對於航海技術的更具時效性的掌握，但是要理解

25 陳佳榮，〈再說《順風相送》源自吳樸的《渡海方程》〉，《海洋史研究》1 期（2017 年），頁 354。

26 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頁 95-96。

為何沒有「雞籠、淡水」的標註，實需要理解這條針路的歷史脈絡，也就是來自聯繫明朝與琉球朝貢關係的重要孔道。

「倭寇」問題侵擾大明朝沿岸地區多年，從西元 1368 年至西元 1374 年這七年間，侵擾次數多達二十三次之多，於是洪武 4 年（1371 年）詔令「瀕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拉開了海禁序幕<sup>27</sup>，這個海禁政策一直到隆慶年間，實行了近 200 年，才稍有緩解，但是對外連動的禁絕是有例外的，那就是開放對外國的朝貢關係；西元 1368 年朱元璋建立明朝，遣使遍諭海外諸國，洪武 5 年（1372）琉球中山王察度遣使入明稱臣納貢，並於洪武 25 年（1392）派遣從子日孜每闊八馬等人入國子監學習<sup>28</sup>，如此「（洪武）二十五年，中山遣子姪及其陪臣子弟入國學。上喜，禮遇獨優；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sup>29</sup>，這「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將可合法在「禁海令」下，進出沿海門戶，如此在這個特殊歷史情境之下，也奠定這段針路航線成為建構出東亞航海路線的契機。

明朝政府不定期遣使冊封琉球國王（表 2），與琉球王朝也不斷地利用機會引進相關製船技術或是物資，如正統 4 年（1439）琉球國中山王尚巴志奏：「本國自洪武迄今，恭事朝廷，數荷列聖憫念，給賜海舟載運。近使者巴魯等貢方物赴京，舟為海風所壞。緣小邦物料工力俱少，不能成舟，乞賜一海舟付巴魯等領回，以供往來朝貢」，或是成化 20 年（1484）琉球國中山王尚真奏：「永樂年間所賜船，破壞已盡，今止存其三。乞自備物料，於福建補造」，或是嘉靖 34 年（1555）琉球國中山王尚清，遣其正議大夫梁顯等朝貢方物，宴賚其使，回賜王如例。尚清復移文禮部，言：「貢舟至港，其勢又壞，請今入貢使臣買海上民舡駕遠」<sup>30</sup>，琉球能如此往來合法地進出

27 聶洪萍，《「東西洋航海圖」與明代中國》，頁 21-22。

28 孫清玲，〈論「閩人三十六姓」在中國海外移民史上的特殊性——東亞朝貢體制下的海外移民個案分析〉，《福建教育學院學報》10 期（2006 年），頁 90。

29 吳幅員編，《流求與雞籠山》（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年），頁 53。

30 陳怡行，〈封舟與戰船：明代福州的造船〉，《政大史粹》11 期（2006 年），頁 17。

大明，也終如成化 9 年（1473）琉球國中山王尚圓：「國王嘗遣人往滿刺加國（麻六甲）收買貢物，被風壞舡，飄至廣東」<sup>31</sup>，這歷年來一來一往之間，逐漸造就琉球船隻掌握該段針路的航海知識，而當琉球船隻直抵東南亞，開始與葡萄牙船隻有了交集，提供東來日本的航線知識。

葡萄牙水手和官員在十五世紀末進入印度洋，為了打通與東亞的貿易管道，極力搜集各地海域的商業貿易、航海路程、商人群體等訊息，1511 年船隊攻佔滿刺加（麻六甲），便以此為據點，向東探勘香料群島，向北前往暹羅、中國沿海，由於船隊中有擅長繪製地圖的人，如 Francisco Rodrigues，曾描繪有五張是描繪滿刺加到中國之間的地圖，繪製時間可能在 1511-1513 年間，其中便寫著「Costa que vai pera a china」（圖 3），意即通向中國的海岸，而東側有一斜置的島嶼，寫著 Lequeoller，此語可能與 Lequeo 有關，<sup>32</sup>以及 1550 年無名氏繪製之《亞洲 - 大洋洲圖》（Asia-Oceania）中，偌大的東亞海域僅標示著 Leqvios（琉球）（圖 4），在 1542-1543 年間，當葡萄牙船隻漂流至日本九州附近的種子島，發現日本航線開始，1550 年葡人獲得默許在上川島每年一次貿易，並開通從上川駛往平戶的航線，一直到 1556 年，1557 年濠鏡（澳門）正式對葡人開放之後，由平戶返航的葡船，首次泊入濠鏡，成為日後澳門前往日本平戶每年定期航班中最重要的海上航線。葡人居中擔任貿易掮客，將中國產品（主要是生絲、絲綢、瓷器等）運往日本，換成白銀帶回澳門，成為商業利潤最為豐厚的重要航線，<sup>33</sup>顯示葡萄牙在茫茫的東亞航海當中，利用「琉球」所建構航海知識來到日本，完全反應這些古地圖的區域意象之中。

31 陳怡行，〈封舟與戰船：明代福州的造船〉，頁 17。

32 陳宗仁，〈Lequeo Pequeno 與 Formosa——十六世紀歐洲繪製地圖對臺灣海域的描繪及其轉變〉，《臺大歷史學報》41 期（2008 年），頁 113-115。

33 陳迎憲，〈海上絲路與地理大發現交匯的澳門海上航線〉，《海表方行 - 海上絲綢之路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41 期（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及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2018 年），頁 113-115。

表 2 明代遣使冊封琉球國王一覽

紀元	西元	事 件
宣德 3 年	1428	欽差內監柴山、副使阮，敕封國王尚巴志。
正統 8 年	1443	欽差正使俞忭、副使劉遜，敕封國王尚忠。
正統 13 年	1448	欽差正使陳搏、副使萬祥，敕封國王尚思達。
景泰 3 年	1452	欽差正使陳謨、副使董守宏，敕封國王尚金福。
景泰 7 年	1456	欽使差正李秉敕、副使劉儉，敕封國王尚泰久。
天順 7 年	1463	欽差正使潘榮、副使蔡哲，敕封國王尚德。
成化 8 年	1472	欽差正使官榮、副使韓文，敕封國王尚圓。
成化 15 年	1479	欽差正使董旻、副使司副張祥，敕封國王尚真。
嘉靖 13 年	1534	欽差正使陳侃、副使高澄，敕封國王尚清。
嘉靖 40 年	1561	欽差正使郭汝霖、副使李際春，敕封國王尚元。
萬曆 7 年	1579	欽差正使蕭崇業、副使謝杰，敕封國王尚永。
萬曆 34 年	1606	欽差正使夏子陽、副使王士楨，敕封國王尚寧。
崇禎 6 年	1633	欽差正使杜三策、副使楊掄，敕封國王尚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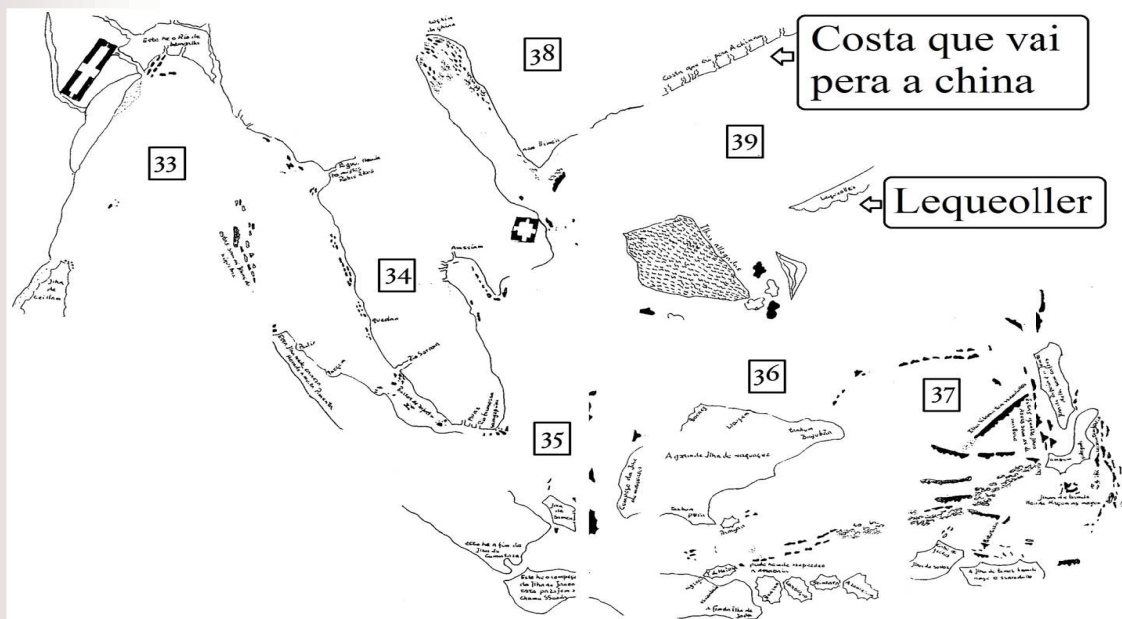


圖 3 十六世紀初 Francisco Rodrigues 所繪東南亞地圖合併版  
 資料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Rodrigues\\_map.png](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Rodrigues_map.png)





圖 4 1550 年《亞洲 - 大洋洲圖》部分

資料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sia\\_oceania\\_anonymous\\_c1550.jpg](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sia_oceania_anonymous_c1550.jpg)

因此要理解「塞爾登地圖」為何沒有「雞籠、淡水」的標註，基於相關資料的缺乏，從北端航線的歷史脈絡而言，來自「時間成本」的考量最為合理，從清代徐葆光「中山傳信錄」來推估，五次的明代冊封琉球，分別有嘉靖 13 年（海行 18 日至琉球 -7 日回福州）、嘉靖 41 年（海行 11 日至琉球 -11 日回福州）、萬曆 8 年（海行 14 日至琉球 -9 日回福州）、萬曆 33 年（海行 8 日至琉球 -11 日回福州），崇禎 6 年（海行 9 日至琉球 -11 日回福州）<sup>34</sup> 等等，以這五次作為統計，得知北端航線的時間成本福州往琉球平均花費約 12 日，而從琉球回福州平均約 10 日。自從 1543 年葡萄牙人踏上日本國土開始，便以澳門為據點進行貿易活動，因為掌握了生絲的分配和定價權，所以葡萄牙人獲得的暴利往往是投資額的 5-10 倍，<sup>35</sup> 暴利當前，從福州到琉球平均需要耗費 10 至 12 天的時間壓力下，為達「賽爾登地圖」北方日本的港

34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頁 18-19。

35 林婉嬌，〈基督教與日本的鎖國〉，《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8 卷 4 期（2006 年），頁 108。



口，也就是針路終點站，九州東海岸上的「兵庫（Bingku、神戸）」，以及鄰近西方標示著五個地名分別是「魚鱗島（Yulindao、平戶）」、「亞里馬王（Arima、有馬）」、「殺子馬（Satsuma、薩摩）」、「殺身灣子（Kagoshima、鹿兒島）」、「籠仔沙機（Nagasaki、長崎）」<sup>36</sup>，在成本壓力下，遠洋航運必須藉由季風全力航行衝刺是可以被理解。

如此反應在「塞爾登地圖」上，繪圖者臆測讀圖者的需求下，除了比「順風相送」的航線更接近「直線」針路訊息，而貿易規模較小的近海航運，如「每年於四、五月間告給文引，駕使鳥船稱往福寧卸載北港捕魚及販雞籠、淡水者，往往私裝鉛、硝等貨潛去倭國」<sup>37</sup>，也就遭到放棄，如此也就沒有明代文獻常見的「淡水」、「雞籠」地名了。

然而細讀「賽爾登地圖」，北端針路也衍生出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歐洲古地圖中臺灣「多島化」的討論。

## 肆、歐洲古地圖的臺灣多島化

歐洲古地圖中臺灣「多島化」的議題，首見伊能嘉矩 1928 年所發表《臺灣文化志》中，曾引用一幅 1596 年林蘇荷頓（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所繪製的地圖（圖 5），提出「臺灣の位置に當りて二個の島嶼を描き、北なるた Formosa き記し、南なるた Leque-Pequeno き記せり。…尚は全島の北三分中位に在る巨大なる河口た、海岸線き誤り認めしものにして」<sup>38</sup>，來凸顯歐洲古地圖臺灣多島化形象的問題，伊能嘉矩也提出造成原因是來自巨大河口的誤認。

36 卜正民，《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香料貿易、佚失的海圖與南中國海》（臺北：聯經，2015 年），頁 169。

37 陳宗仁，〈「北港」與「Pacan」地名考釋：兼論十六、七世紀之際臺灣西南海域貿易情勢的變遷〉，《漢學研究》21 卷 2 期（2003 年），頁 252。

38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上卷》（東京：刀江書院，1928 年），頁 33。



圖 5 Linschoten 繪製地圖部分

資料來源：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上卷》，頁 32。

但是曹永和在 1962 年所發表的「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一文有不同看法，其提出「舊說對林蘇荷頓的三島圖，認為係由於在海上看到很大的河口，誤認臺灣是三個島…這種說法似有問題。這很可能是當初葡萄牙的航海記有些是根據得自中國人的見聞，記著小琉球，有些是把他們自己望見而所命名的美麗島（Ilha Formosa）記錄下來，而在葡萄牙本國的製圖家從這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據他們的技術上的想像，妥為安排…真的認為附近有二島或三島的存在了」<sup>39</sup>。

面對這個說法陸傳傑在 2018 年在「被誤解的臺灣古地圖」一書提出的疑問，「早在 1554 年，葡萄牙著名的繪圖師羅伯·歐蒙（Lopo Homen）便將臺灣描繪為單一大島，島名為 Fremosa（應為 Ferosa 之誤）…可是在後來的 6、70 年間，日本列島與菲律賓群島從無到有，從局部到完整，…但為何 1554 年之後，葡萄牙的製圖大師們卻開始靠『想像』來繪製臺灣島呢？…

39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 年），頁 325、364。

惟獨臺灣島的輪廓非但沒有明顯的進步，反而出現三島式如此脫離現實的樣貌。曹永和沒有嘗試解答問題發生的原因，似乎也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獨特性…因為之後的葡萄牙宮廷繪圖師並沒有繼承歐蒙對臺灣島的畫法，如 1561 年維利烏（Bartolomeu Velho）繪製的《世界圖》（General Chart of the Globe）的兩個島，1568 年杜拉多（Fernao Vaz Dourado）的《地圖集·東亞海圖》（Southeast China, Japan, East Indies）的三個島」。<sup>40</sup>關於以上的提問，如此能夠符合歷史邏輯來回答多島化問題，答案就在地圖文本的生產過程，也就是來自針路引用上的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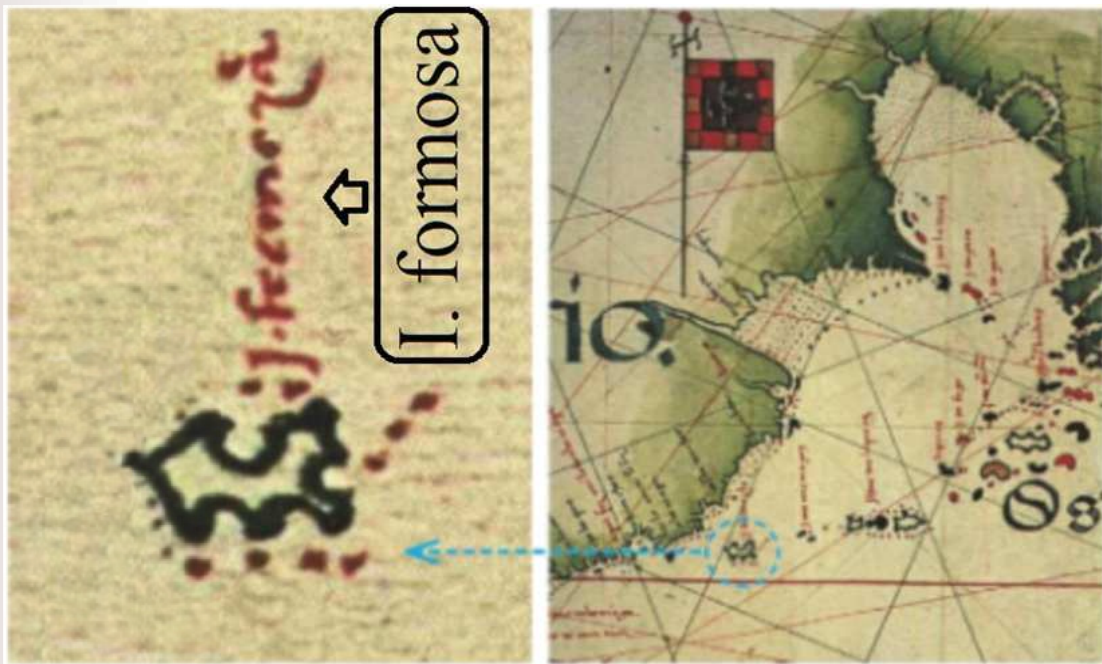


圖 6 羅伯·歐蒙世界圖關於臺灣部分與放大

資料來源：翁佳音、黃驗，《解碼臺灣史 1550-1720》（臺北：遠流，2017 年），頁 31。

1554 年羅伯·歐蒙（Lopo Homen）地圖所使用的航海文本，必然曾使用臺灣北端針路一路來到日本，推斷為 1554 年以前，提供者不斷前往日本的葡萄牙船隻而來，如 1543 年葡萄牙人抵達九州種子島、1549 年沙勿略（Francis Xavier）抵達九州鹿兒島傳播天主教<sup>41</sup>等等，如此羅伯·歐蒙才

40 陸傳傑，《被誤解的臺灣古地圖》（臺北：野人，2018 年），頁 50。

41 沈堅主編，《世界文明史年表》（上海：上海古籍，2000 年），頁 952、957。



能在日本與福建之間海域，繪製出一連串島嶼，位在北回歸線以北，由南向北依序分別為 I. formosa、I. dos reis magos、I. dos lequios、lequios、I. do fogo 等，圖中（圖 6）又以不同的字體，寫著 Os lequios，意指上述島嶼均屬於 lequios（琉球）區域。<sup>42</sup> 相較於黎牙實比（Miguel López de Legazpi）率第一艘西班牙馬尼拉大帆船於 1565 年穿過太平洋到達宿霧島（Cebú），並於 1571 年佔領馬尼拉，<sup>43</sup> 整整晚了十多年以上，如此 Lopo Homem 在 1554 年繪製的 Portolano 式海圖，證明臺灣被稱為 formosa 來自於葡萄牙航海者登錄的推論，雖然可靠文獻顯示葡萄牙人絕大部分指稱臺灣本島為 Lequeo pequeno，反而是 1580 年代的西班牙人才比較確定以福爾摩沙（formosa）來指稱臺灣，<sup>44</sup> 但是透過針路的理解就會發現，長年以來判讀大航海時期地圖所犯的一個誤區，那就是以今日的「formosa」來看待過去的「formosa」，以「全島」來解讀「部分島嶼」。

若以羅伯·歐蒙地圖所繪製的「formosa」並非是現今所認知的「全島」，而是北端針路的參考點，在這個前提下，這就能回答陸傳傑的疑問「惟獨臺灣島的輪廓非但沒有明顯的進步，反而出現三島式如此脫離現實的樣貌」，因為北端與西端兩條針路會對應不同的參考點，尤其以澎湖作為分界，也就是「塞爾登地圖」內的「彭」（圖 1），北端針路需通過澎湖北方，而西端針路通過澎湖南方，因此在 1597 年在西班牙科羅內爾（Hernando de los Ríos Coronel）所繪製「呂宋、艾爾摩沙島與部分中國沿岸圖（Isla Luzon, Isla Hermosa and a part of costa de la China）」（圖 7）未問世之前，這第一張臺灣獨島地圖，<sup>45</sup> 或是被認為是西方首幅詳盡的臺灣地圖<sup>46</sup> 出現之前，是

42 陳宗仁，〈Lequeo Pequeno 與 Formosa——十六世紀歐洲繪製地圖對臺灣海域的描繪及其轉變〉，頁 126。

43 博克塞，〈馬尼拉大帆船：絲綢和白銀的誘惑（1565~1815）〉，《文化雜誌》102 期（2018 年），頁 23、27。

44 翁佳音，〈葡萄牙人與“福爾摩沙”——並論 1582 年的船難〉，《歷史月刊》220 期（2006 年 5 月），頁 79。

45 翁佳音、黃驗，〈解碼臺灣史 1550-1720〉，頁 34。

46 楊宗霖，〈評鮑曉鳴著，那瓜譯，《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臺大歷史學報》44 期（2009 年），頁 207。

沒有任何證據支持有人可以證明臺灣是單一島嶼，換言之，1596 年林蘇荷頓的多島化，是結合「北端針路」與「西端針路」的作品，這個情形在陳祖綬於崇禎 9 年（1636）刊刻的《皇明職方地圖》，<sup>47</sup> 該地圖集的「福建地圖」當中（圖 8），「澹（淡）水、雞浪（籠）」與「小琉球」分為兩島，就然是針路差異所造成的。

那為何「塞爾登地圖」繪製「臺灣」是一個單一島嶼呢？合理答案在於若比對明代萬曆年陳第在〈舟師客問〉「沈子嘗私募漁人，直至東番，圖其地里，乃知彭湖以東，上自魴港、下至加哩，往往有嶼可泊」<sup>48</sup>，就可以發現「塞爾登地圖」所標示的「北港」、「加里林」地名，實為陳第筆下的「東番」南北界，如此「塞爾登地圖」的「臺灣」意象，便是使用「西端針路」所發現「Lequeo pequeno（小琉球）」為底圖基礎，在此前提之下，來推論「加里林」到底在那裡。

47 周運中，〈明末臺灣地圖的一則新史料〉，《福州大學學報》1 期（2014 年），頁 7。

48 沈有容編，〈閩海贈言〉，頁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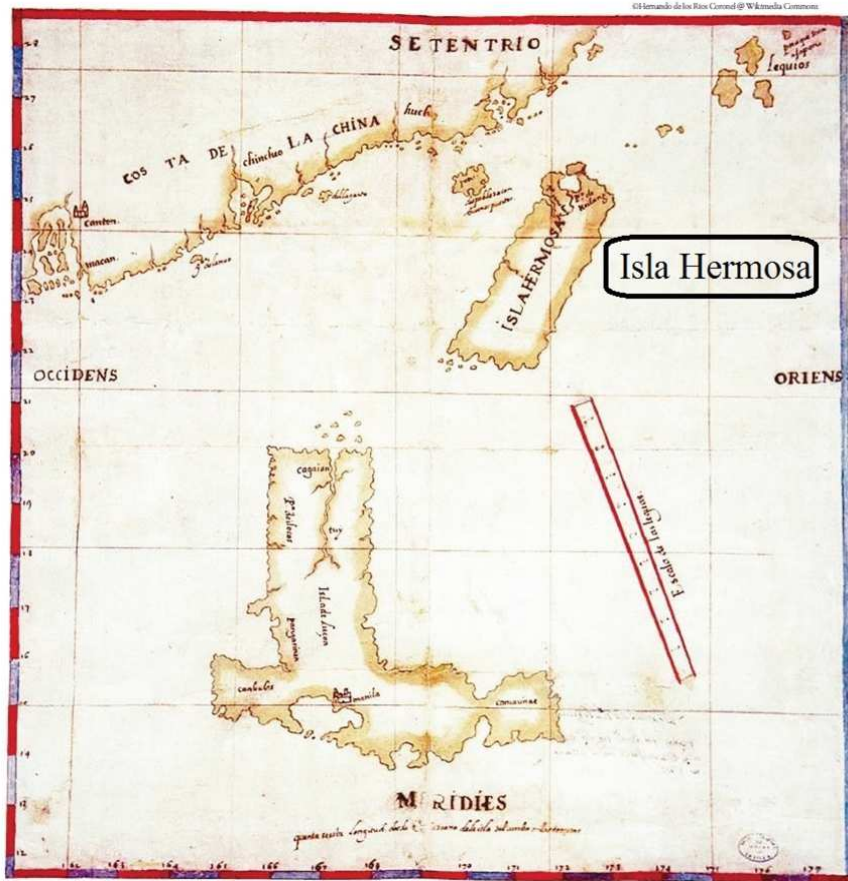


圖 7 《呂宋、艾爾摩沙島及部分中國沿岸圖》

資料來源：野人文化臉書 2018 年 10 月 9 日貼文，<https://www.facebook.com/verenpublis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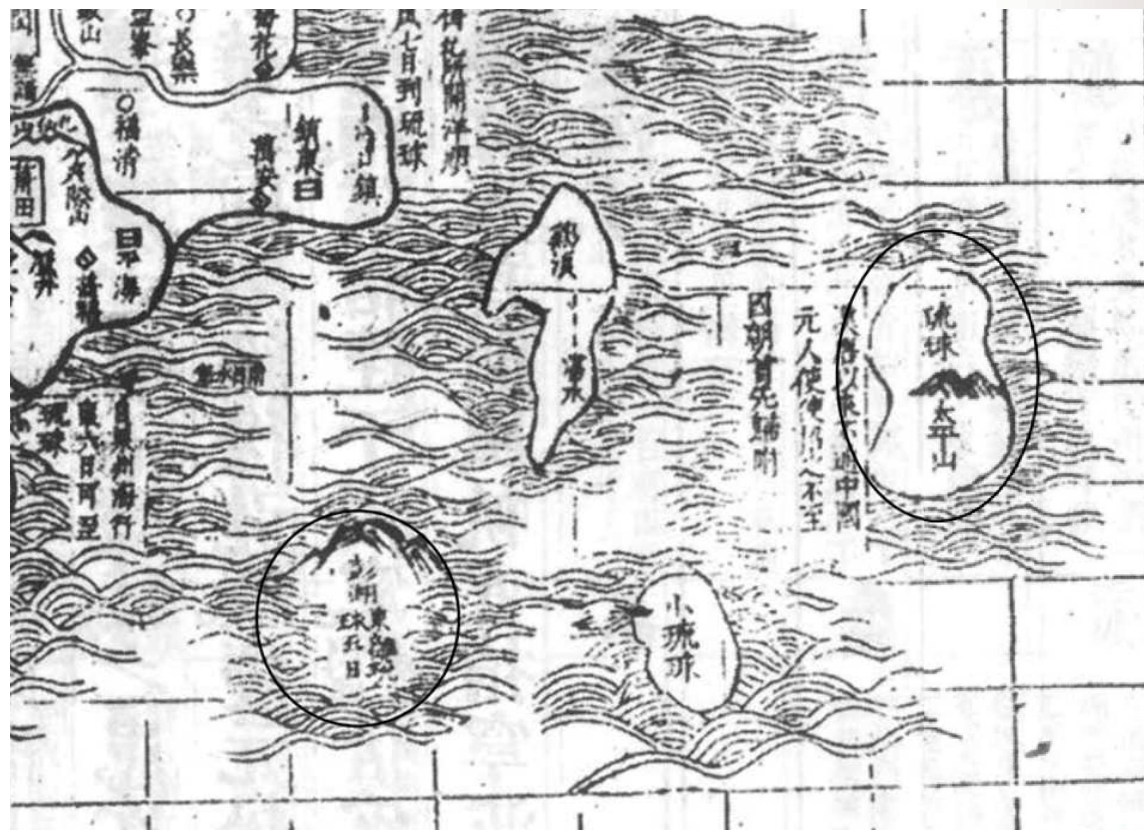


圖8 《皇明職方地圖·福建地圖》局部

資料來源：沈玉慧，〈朝鮮王朝海外知識的形成與累積——以《輿地圖·朝鮮日本琉球國圖》為例〉，《故宮學術季刊》32卷2期（2016年），頁151。

## 伍、通往呂宋的西端針路

「塞爾登地圖」臺灣西端針路在圖內標注「甲卯（編按：82.5度）」-「丙（編按：165度）」到馬尼拉，但是比對「順風相送」中「太武往呂宋」或「泉州往彭家施蘭」的針路，如「（太武往呂宋）太武開船，辰巽（編按：127.5度）七更、取澎湖山，巳丙（編按：157.5度）五更見虎仔山，單丙（編按：165度）及巳丙（編按：157.5度）六更取沙馬歧頭，單丙（編按：165度）二十更取筆架山，與大港口和相對及紅荳嶼」<sup>49</sup>，或是「（泉州往彭家施蘭）」

49 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頁88。

長枝開船，丙巳（編按：157.5 度）七更取澎湖。丙午（編按：172.5 度）七更取虎尾山，沿山五更取沙馬頭」<sup>50</sup>，而這段針路正是東洋針路的起點，萬曆 45 年（1617）張燮所整理各文本的「東西洋考」，其謂「舶人舊有航海針經，皆俚俗未易辨說；余為特考而文之。」<sup>51</sup>，其中卷九「舟師考」當中，所介紹的「東洋針路」，便稱呼「從漳州、泉州、過澎湖，南下呂宋」<sup>52</sup>。

歷史上使用通往呂宋的西端針路，最早具名者莫過於萬曆 2 年（1574）6 月對於海盜林鳳的追捕，在劉堯誨所編「督撫疏議」中的「報剿海賊林鳳疏」及「林賊遁番疏」等二疏，有更精準的路徑移動，可以推估時序上林鳳從萬曆 2 年 5 月 30 日進入澎湖，6 月 10 日進入魴港及新港，7 月 14 日又退居澎湖，8 月以後又一次進入新港，再於 11 月 7 日離開新港去呂宋。<sup>53</sup> 登陸呂宋以後，遭到西班牙人的阻擊，在與西班牙軍隊作戰中，擊斃其駐菲律賓總指揮戈尹特（Maytln oiti）。後在彭家施蘭省（Pangasinan Province）的林加延灣（Lingayen G）建立都城，萬曆 3 年（1575）6 月，在彭家施蘭因受西班牙和明軍合圍，苦戰不支，遂率 40 餘艘戰艦巧妙突圍直抵臺灣，<sup>54</sup> 局勢到了萬曆 4 年（1576）3 月，因為「總督兩廣侍郎凌雲翼以廣賊林鳳棄眾投番，撫散餘黨二千，報下，兵部議謂鳳既遠遁，宜聽便宜計取或修備以待之，而賊黨盡散，地方寧謐」<sup>55</sup>，林鳳事件才告平息，也讓福建通往呂宋的西端針路，不落文字卻見證於明代官方文書當中。

比較傳統針路文本與「塞爾登地圖」的差異，與前述北端針路相同，一樣的起始點與終點，但是傳統針路從福建到卡加揚（呂宋）需要的三個「山」

50 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頁 94。

51 周憲文編，《諸番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頁 80。

52 一愚編，《漳州府志選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7 年），頁 1。

53 湯開建，〈明隆萬之際粵東巨盜林鳳事蹟詳考——以劉堯誨《督撫疏議》中林鳳史料為中心〉，《歷史研究》6 期（2012 年），頁 53。

54 劉俊珂，〈明清海禁政策與海上商業力量的消長——以王直、林鳳、張元隆海商集團為物件的個案分析〉，《南都學壇：南陽師範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報》34 卷 5 期（2014 年 9 月），頁 33。

55 陳學霖，《明代人物與史料》（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342。

參考點，即澎湖、虎仔山、沙馬頭，如此，若比對《順風相送》所提供的訊息，而略晚的《指南正法》，指出「（泉州往邦仔系蘭山形水勢）澎湖山巽已七更取虎頭山，即打狗仔。虎頭山沿山使十更取沙馬岐頭山」<sup>56</sup>，證明「虎仔山」就是「打狗仔（山）」，而「塞爾登地圖」針路皆不需要，可以近乎直線的方式由福建通往呂宋，憑藉的當然是當時先進的導航技術，否則西班牙黎牙實比如何在沒有任何「山」的導引下，在 1564 年自墨西哥出發，在 1565 年成功穿越太平洋到達菲律賓（呂宋）宿霧島，建立第一個殖民據點，<sup>57</sup>也顯示出「塞爾登地圖」繪製者憑藉著西班牙新式航海技術，可以擺脫傳統針路的依賴，但是「塞爾登地圖」仍然保留傳統針路的參考點，因此要解開「加里林」於何處，「小琉球」歷史脈絡成為一把重要的鑰匙。

在前述林蘇荷頓地圖當中，相較於「Formosa（福爾摩沙）」不見於當時的中文稱謂，「Leque-Pequeno（小琉球）」則是很清楚地有著明代文獻可供追循，雖然歷史上小琉球不全然等同於臺灣，但是根據區位的排比，還是可以發現有些「小琉球」指的是現今的「臺灣」，如「若番船泊澎湖，距東番、小琉球不遠」<sup>58</sup>、「從長樂廣石出海，隱隱一小山浮雲，即小琉球也」<sup>59</sup>，嘉靖 34 年出使日本的鄭舜功，事後在「日本一鑿」寫道：「泉海地方，約去金門四十里，下去永寧八十里。或自回頭徑取小東島，島即小琉球」<sup>60</sup>，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小琉球」的說法並不是指整個「臺灣」，因為在當時的認知上，北端還有個「Formosa（福爾摩沙）」。

萬曆 33 年（1605）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徐必達摹繪的「乾坤一統海防全圖」出現「小琉球國」標註，中間有一條河流，這是標註臺灣那一條河流？雖有濁水溪或鹽水溪的說法，<sup>61</sup>但是河流出海口有小山立於兩旁，不符合中

56 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頁 160。

57 沈堅主編，《世界文明史年表》，頁 965-966。

58 望陸編，《明經世文編選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 年），頁 192。

59 董應舉，《崇相集選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7 年），頁 134。

60 周運中，〈明末臺灣地圖的一則新史料〉，《福州大學學報》，頁 5。

61 周運中，〈明末臺灣地圖的一則新史料〉，《福州大學學報》，頁 5-6。



部與嘉南平原的區域意象，唯一符合此意象唯有虎仔山（打狗山、壽山）與旗後山所包圍的高雄港與愛河，參考原圖繪於 1653 年《Pas-kaart van de Chineesche Kust, Langs de Provi Quantung en Fokien, als ook het Eyland Formosa（中華沿海地區海圖：廣東、福建與福爾摩沙島）》，圖內發現一條名為「Taccariangh（搭加里揚）河」<sup>62</sup>，若以傳統針路的三個「山」參考點，即澎湖、虎仔山（打狗山、壽山）、沙馬頭來考量，「乾坤一統海防全圖」的繪製者挑選西端針路的「虎仔山（打狗山、壽山）」作為登陸的考量，更是符合航行的安全考量。



圖 9 萬曆 33 年乾坤一統海防全圖內「小琉球國」

資料來源：賴志彰、魏德文、高傳棋，《竹塹古地圖調查研究》（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3 年），頁 37。

如此，已佔領呂宋的西班牙而言，「小琉球」在十六世紀的東亞航道裡，就扮演福建到呂宋的參考點位置，如 1597 年哥羅內爾從馬尼拉寄予國王陛下的報告書，更提出如此見解：「本島與該島最接近距離為卡加揚省（Cagayan）東北端 36 里格…那是船隻從中國與日本到此城（馬尼拉）以及

62 施雅軒，〈17 世紀高雄搭加里揚地域的重構〉，《高雄文獻》8 卷 3 期（2018 年 11 月），頁 10。

許多其他地方的必經之地」<sup>63</sup>，證明這個論點。

而 1586 年加入天主教道明會，1587 年來到呂宋（菲律賓）的傳教士高母羨（Juan Cobo、高茂羨）受西班牙總督命令前往日本，1592 年在翻譯菲律賓總督致豐臣秀吉的回信上，<sup>64</sup> 提出「管豁（轄）小琉球等軍民呈奉」（圖 10）<sup>65</sup> 的說法，若比對隔年 1593 年豐臣秀吉發出的書信，原件並無標題，但是落款稱之「高山國」，不同學者以此為重點加以命名，如村上直次郎 1929 年稱為「豐臣秀吉の臺灣に入貢を促したる書」<sup>66</sup>，幣原坦在 1938 年稱「豐臣秀吉の招諭文書」<sup>67</sup>，陳文添在 2003 年稱為「豐臣秀吉諭高山國文書」<sup>68</sup>，如此僅隔一年的歷史文本，可以推論「小琉球」與「高山國」在豐臣秀吉理解中，並不屬於同一個地方，但是現今的解讀上，「小琉球」與「高山國」卻都是「臺灣」另一個代稱的矛盾現象，就是針路差異的參考點所造成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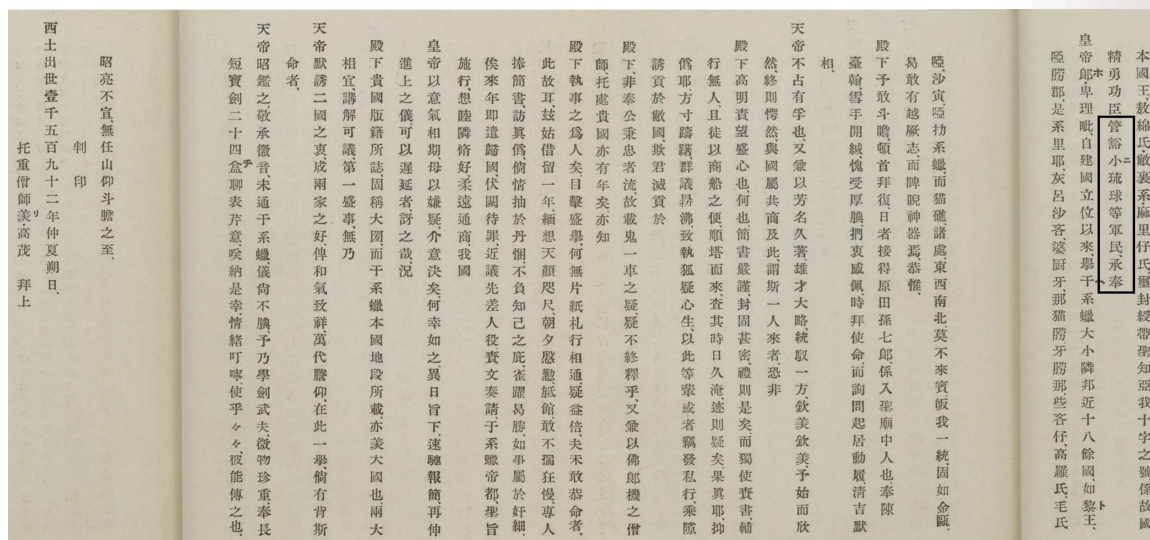


圖 10 高母羨至豐臣秀吉書信

資料來源：村上直次郎譯註，《異國叢書第 11》，頁 34-36。

- 63 李毓中主編，《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1）》（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 年），頁 334-335。
- 64 張西平，〈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域外傳播研究的一個嘗試〉，《國際漢學》4 期（2015 年），頁 173。
- 65 村上直次郎譯註，《異國叢書第 11》（東京：駿南社，1929 年），頁 34。
- 66 村上直次郎譯註，《異國叢書第 11》，頁 69。
- 67 幣原坦，《南方文化の建設へ》（東京：富山房，1938 年）。
- 68 陳文添，〈豐臣秀吉諭「高山國」文書〉，《臺灣文獻》，別冊 4 期（2003 年 03 月），頁 8~11。



萬曆 30 年（1602）12 月，也就是征討林鳳過了將近三十年，沈有容揮軍來臺，即「萬曆壬寅臘月初旬，將軍沈有容率師渡海，破賊東番。海波盪定，除夕班師。」<sup>69</sup>，而隨軍的連江人陳第，「與偕往，共破倭，泊舟大員。其酋長大彌勒等持鹿、酒以獻，因備詢其土俗及山海形勢，述之成篇。」<sup>70</sup>，將見聞於萬曆 31 年（1603）寫成「東番記」一文：「東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彭湖外洋海島中；起魷港、加老灣，歷大員、堯港、打狗嶼、小淡水、雙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幫坑，皆其居也。」<sup>71</sup>，就會發現，「東番記」一系列的臺灣地名，有著與「佳里林」發音雷同的「加哩林」，而比對「舟師客問」，就會發現「沈子嘗私募漁人，直至東番，圖其地里，乃知澎湖以東，上自魷港、下至加哩，往往有嶼可泊」<sup>72</sup>，由於「東番記」與「舟師客問」同為陳第的作品，在相同的文本脈絡上，可以斷定不管是「加哩」、「加哩林」或是「加里林」，該地名是「東番」或是「小琉球」的南界。

如此空間位置的比對，讓令人懷疑「加里林」就是荷蘭時期「熱蘭遮城日誌」筆下「Taccariangh（搭加里揚）」的漢譯，由於陳第的東番記成文於 1603 年，最早的「Taccariangh（搭加里揚）」紀錄，在於「熱蘭遮城日誌」的 1633 年，<sup>73</sup> 中間約有三十年的落差，但是考古資料的整理，可以證明在金屬器（或金石併用）時代（距今約 2000-400 年），高雄平原的海岸線向外退出，南北部的平原地帶均有遺址進入，該時期高雄平原南部的平原地帶及屏東平原上亦出現了少量的遺址分布（圖 11），<sup>74</sup> 證明四百年前現今高雄市一帶，已經有人群聚落分布。在沒有大型戰爭或是災難發生的前提，「熱蘭遮城日誌」的「搭加里揚（Taccariangh）」與「東番記」筆下的「加哩

69 沈有容編，《閩海贈言》，頁 28。

70 杜臻等人，《澎湖臺灣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頁 5。

71 沈有容編，《閩海贈言》，頁 24。

72 沈有容編，《閩海贈言》，頁 29。

73 施雅軒，〈17 世紀高雄搭加里揚地域的重構〉，《高雄文獻》，頁 16。

74 龔琪嵐、齊士崢、蔡衡、劉益昌、黃文樹，〈高屏平原地區新石器時代以來史前遺址分布與環境變遷關係之研究〉，《中國地理學會會刊》48 卷 6 期（2012），頁 57。

(Cari)」，兩者滿足歷史發展的空間脈絡，符合「賽爾登地圖」的「Cariangh (加里林)」位於現今高雄市的推論，而這個推論在地名的發音上獲得支持，即 Taccariangh- Cari- Cariangh 皆來自同組地名字根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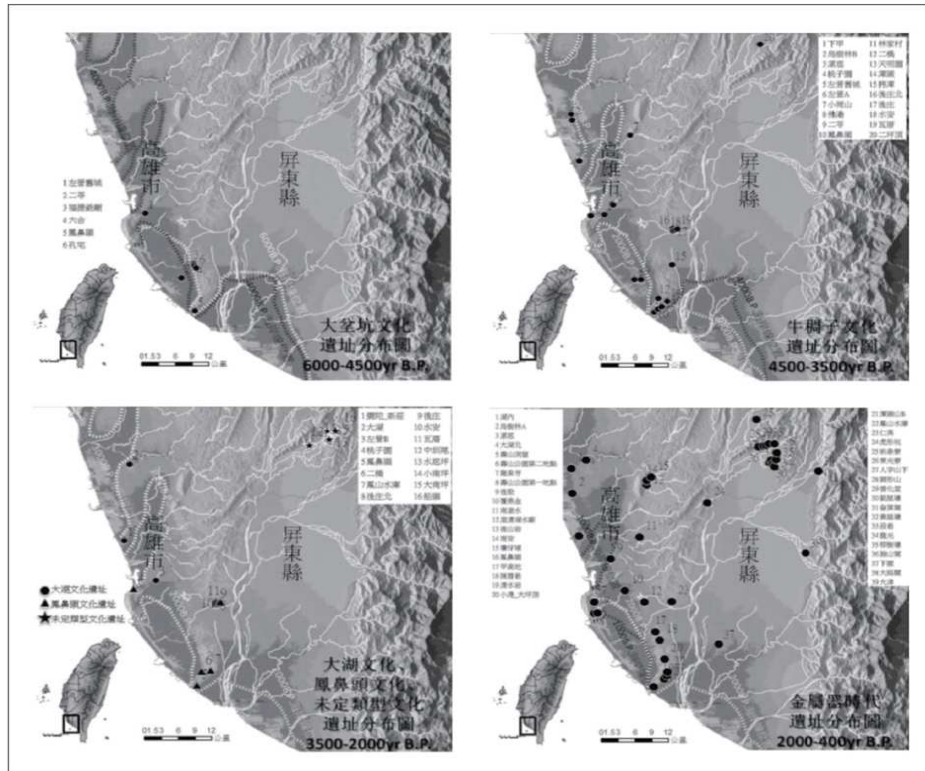


圖 11 高屏平原地區新石器時代以來史前遺址分布及海岸變遷  
資料來源：龔琪嵐等，〈高屏平原地區新石器時代以來史前遺址分布與環境變遷關係之研究〉，頁 57。

## 陸、結論

本文從「賽爾登地圖」關於臺灣相關的兩條針路，即北端與西端，若依李兆良所提出研究古地圖的原則和常識：一、16 世紀歐洲繪製世界地圖者一般不是探險者，他們的任務是把收集的資訊匯集成圖，想像不能比親歷真確，抄本無法比正本精細正確；二、繪圖人最熟悉的是最接近自己家園的地域，離開家園越遠，越含混不清、簡單、失真；三、每一幅地圖都有時間印

記，地名的顯隱可以決定成圖年代。<sup>75</sup> 依照這些原則來看待「賽爾登地圖」的所登錄的「臺灣」地名，會有以下的發現：

首先，關於「賽爾登地圖」內的兩個臺灣地名，反映在「小琉球」或是「東番」的兩個端點；在明代文獻充分顯露「北港」在沿海漁業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即「瀕海之民，以漁為業；其採捕於澎湖、北港之間者，歲無慮數十百艘。」<sup>76</sup>，而「加里林」地名，透過古地理學的比對，符合區位又接近「加哩」地名發音，以「Taccariangh（搭加里揚）」的漢譯最有可能，也就是現今的高雄地區。

第二，透過兩條針路分別有各自的參考點來推論，在航海科技未發達，或是沒有理解臺灣是否為單一島嶼的動機下，會形成臺灣在歐洲古地圖的多島化面貌，換言之，北端針路會透過「福爾摩沙」定位，而西端針路則透過「小琉球」定位，而更南方的「幼小琉球」仍歸西端針路的使用者，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何現在的屏東縣琉球鄉被暱稱為「小琉球」，而不是荷蘭時期所謂的「金獅島」或是「拉美島」的源由，<sup>77</sup> 因此歐洲古地圖的臺灣多島化並非誤畫，而是針路來源文本所造就的結果。

第三，利用所建構的「多島觀」，來理解當時的事件，例如 1593 年豐臣秀吉的書信中，所謂的「高山國」到底在那裡？雖然事後可以定位於臺灣，但是為何取名叫做「高山國」卻相當突兀，以此「多島觀」下，可以理解 1592 年高母羨帶來西班牙欲佔領所謂「小琉球」或「東番」的訊息，豐臣秀吉為與之對抗，自然選擇與「小琉球」抗衡的「formosa」，並經人漢譯為「高山國」，如此便符合歷史脈絡的解釋。

75 李兆良，《坤輿萬國全圖解密》（臺北：聯經，2012 年），頁前言 13-14。

76 望陸編，《明經世文編選錄》，頁 241-242。

77 施雅軒，〈荷蘭時期屏東拉美島的征討歷程〉，《屏東文獻》23 期（2019 年），頁 4。

## 參考書目

### 壹、舊籍文獻

- 一愚編，《漳州府志選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7年。
-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上卷。東京：刀江書院，1928年。
- 百吉編，《清一統志臺灣府》。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
- 吳幅員編，《使琉球錄三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年。
- 吳幅員編，《明史選輯》。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年。
- 吳幅員編，《流求與雞籠山》。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年。
- 村上直次郎譯註，《異國叢書第11》，東京：駿南社，1929年。
- 杜臻等人，《澎湖臺灣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 沈有容編，《閩海贈言》，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
- 周凱，《廈門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 周憲文編，《諸番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 孫元衡，《赤崁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
-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年。
- 望陸編，《明經世文編選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年。
- 董應舉，《崇相集選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1967年。
- 幣原坦，《南方文化の建設へ》。東京：富山房，1938年。

## 貳、專書（近代）

- 卜正民，《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香料貿易、佚失的海圖與南中國海》。  
臺北：聯經，2015 年 9 月。
- 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中外交通史籍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4 月。
- 李兆良，《坤輿萬國全圖解密》。臺北：聯經，2012 年 4 月。
- 李毓中主編，《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1）》。南投：國史館臺灣文  
獻館，2008 年 6 月。
- 沈堅主編，《世界文明史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9 月。
- 周婉窈，《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臺北：聯經，2012 年 3 月。
- 翁佳音、黃驗，《解碼臺灣史 1550-1720》。臺北：遠流，2017 年 9 月。
-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 年。
- 陳迎憲，〈海上絲路與地理大發現交匯的澳門海上航線〉，《海表方行 - 海  
上絲綢之路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劉詠聰等編。香港：香港歷  
史博物館及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2018 年。
- 陳學霖，《明代人物與史料》。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年月。
- 陸傳傑，《被誤解的臺灣古地圖》。臺北：野人，2018 年 10 月。
- 湯錦臺，《閩南海上帝國：閩南人與南海文明的興起（附贈全彩大地圖）》。  
臺北：如果出版，2013 年 3 月。
- 黃清琦，〈紙頁上的大海東西方航海圖的發展歷程〉，《瞰海》，故事編輯  
部編輯。臺北：廣場出版，2017 年 8 月。
- 賴志彰、魏德文、高傳棋，《竹塹古地圖調查研究》。新竹：新竹市文化局，  
2003 年。
- 聶洪萍，《「東西洋航海圖」與明代中國》。Oxford：University of Oxford，  
2014 年。



### 參、期刊論文

- 翁佳音，〈葡萄牙人與“福爾摩沙”——並論 1582 年的船難〉，《歷史月刊》220 期（2006 年 5 月），頁 72-79。
- 翁佳音，〈釋〈東番記〉中的近代初期番漢關係〉，《原住民族文獻》，20 期（2015 年 4 月），頁 47-53。
- 張西平，〈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域外傳播研究的一個嘗試〉，《國際漢學》，4 期（2015 年），頁 171-185。
- 張榮、劉義杰，〈《順風相送》校勘及編成年代小考〉，《國家航海》，3 期（2012 年 12 月），頁 78-96。
- 陳文添，〈豐臣秀吉諭「高山國」文書〉，《臺灣文獻》，別冊 4 期（2003 年 03 月），頁 8~11。
- 陳佳榮，〈再說《順風相送》源自吳樸的《渡海方程》〉，《海洋史研究》1 期（2017 年），頁 354-64。
- 陳佳榮，〈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通交圖〉，《海交史研究》2 期（2011 年），頁 52-66。
- 陳宗仁，〈「北港」與「Pacan」地名考釋：兼論十六、七世紀之際臺灣西南海域貿易情勢的變遷〉，《漢學研究》，21 卷 2 期（2003 年 12 月），頁 249-278。
- 陳宗仁，〈Lequeo Pequeno 與 Formosa ——十六世紀歐洲繪製地圖對臺灣海域的描繪及其轉變〉，《臺大歷史學報》，41 期（2008 年 6 月），頁 109-164。
- 陳宗仁，〈Selden Map 有關臺灣與琉球的描繪及其知識淵源：兼論北港與加里林的位置與地緣意涵〉，《臺灣史研究》，27 卷 3 期（2020 年 9 月），頁 1-42。

陳怡行，〈封舟與戰船：明代福州的造船〉，《政大史粹》，11 期（2006 年 12 月），頁 1-50。

博克塞，〈馬尼拉大帆船：絲綢和白銀的誘惑（1565~1815）〉，王志紅譯，《文化雜誌》，102 期（2018 年），頁 22-30。

湯開建，〈明隆萬之際粵東巨盜林鳳事蹟詳考——以劉堯誨《督撫疏議》中林鳳史料為中心〉，《歷史研究》6 期（2012 年），頁 43-65。

楊宗霖，〈評鮑曉鷗著，那瓜譯，《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臺大歷史學報》，44 期（2009 年 12 月），頁 205-218。

劉俊珂，〈明清海禁政策與海上商業力量的消長——以王直、林鳳、張元隆海商集團為物件的個案分析〉，《南都學壇：南陽師範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報》，5 期（2014 年 9 月），頁 32-35。

錢江，〈一幅新近發現的明朝中葉彩繪航海圖〉，《海交史研究》，1 期（2011 年），頁 1-8。

龔琪嵐、齊士崢、蔡衡、劉益昌、黃文樹，〈高屏平原地區新石器時代以來史前遺址分布與環境變遷關係之研究〉，《中國地理學會會刊》，48 卷 6 期（2012），頁 39-62

#### 肆、網路資料

Asia oceania anonymous c1550，網址：[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sia\\_oceania\\_anonymous\\_c1550.jpg](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sia_oceania_anonymous_c1550.jpg)

<https://www.facebook.com/yerenpublish/> 野人文化臉書 2018 年 10 月 9 日貼文。

Rodrigues map，網址：[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Rodrigues\\_map.png](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Rodrigues_map.png)

塞爾登地圖，網址：<https://seldenmap.bodleian.ox.ac.uk/>

## **Discussion on Place Names of Taiwan by the Selden Map of China in Ming Dynasty- A case of Zhenlu interpretation**

Shih, Ya-Hsuan \*

### Abstract

The "the Selden Map of China " is an ancient map of East Asia discovered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of Oxford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2008. Many scholars deduced that it should belong to the work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because it has an image of Taiwan. , Which makes the two place names marked above-"Beigang (北港)" and "Galilin (加里林)", particularly attracting attention. This article will conduct relevant discussions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series of documents.

Aiming at the multi-islandization of Taiwan's ancient maps in Europe, the text is drawn using the discussion ancient maps. This article uses the needle path text to obtain. This article can obtain an explanation in line with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rough the acquisition of Zhenlu (針路). The "Taiwan" in the " the Selden Map of China " is not a complete island, but a "small island". The corresponding version of " Xiaoliuqiu ", and the "Galilin (加里林)" at the southern end is located in Kaohsiung and comes from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he name of the "Taccariangh (搭加里揚)" tribe.

Keywords : The Selden Map of China, Taiwan, Historical Geography,  
Place Name, Zhenlu